

《资本论》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六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综述

肖 斌 袁思远

为了纪念《资本论》第1卷出版150周年，进一步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六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暨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第七次研讨会”于2017年9月22—24日在厦门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办公室、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研究所承办，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协办。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教授、厦门大学原党委书记吴宣恭教授等出席会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近200名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一、《资本论》及手稿文本理论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张旭教授强调，在我们关注《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的研究过程和结论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资本论》的方法，尤其是要特别注意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引证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考夫曼对《资本论》方法的评论。

针对历史上各种对《资本论》的误解、曲解甚至否定，暨南大学胡世顿教授列举了理论界曾经和正在出现的各种反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谬论，诸如供求价值论、效用价值论、物化劳动价值论、资源贡献价值论、人力资本论、广义价值论、联合劳动价值论、整体劳动价值论等，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理论的核心内容都是在照搬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所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并提出必须旗帜鲜明地捍卫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武汉大学屈炳祥教授则通过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与马克思《资本论》的横向比较，认为《21世纪资本论》一书没有向我们提出所谓具有时代意义的问题，也没有作出我们时代最有创见的回答。

在论及《资本论》的整体性议题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斌研究员指出：《资本论》第1卷具有它的独立性，可以独立存在。但《资本论》本质上叙述的是剩余价值的整个生涯，这也是《资本论》全部三卷的整体性之所在。其中，《资本论》全部三卷分别对应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只有全部三卷合在一起才具有《资本论》所论述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完整性或整体性。

四川大学张衔教授指出，要明确《资本论》第1卷的劳动价值论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指导意义，坚持用《资本论》原理分析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更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洞察《资本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警示作用。南京财经大学何干强教授从《资本论》的宏观经

济研究方法审视了科尔内ⅡB模式的弊病。他认为,《资本论》遵循唯物史观,揭示出宏观经济形态一般结构及其所有制层面对宏观经济运动状态的决定性作用,这对于我们认清西方经济学的弊病,具有重大意义。科尔内关于管理体制改革的ⅡB目标模式,是搬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出来的;它完全撇开了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在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上,打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烙印,实质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具有极大危害性。

江苏大学王志刚副教授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从总体性视野出发,阐明“现实的个人”不仅是社会性、历史性的存在,而且是空间性的存在。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空间”被更多地赋予了自主性力量的今天,如何正确地处理好时间与空间、生产辩证法与空间辩证法、历史解放与空间解放之间的关系,如何建构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空间理论,对于回应西方激进左翼的理论诉求、诠释当下资本主义的生存境遇和增强马克思主义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道一助理研究员探讨了《资本论》第1卷中的“亚里士多德与边沁之争”。他认为,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旗帜鲜明地论述了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非科学性,指出经济学真正的研究起点应当是“人性一般”;马克思又通过对他所尊敬的古代哲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对于“经济学”概念的思辨的引述,表明了他所建构的“经济学”理论是要探究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并由此指引出对于“美好生活”的探寻之道。

二、《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程恩富教授认为,《资本论》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体系、规律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均需要继续运用这一基本方法;《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并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系统深入地阐明其产生、演变和发展趋势,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基本层面和运行机制;《资本论》具有科学揭示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运行的概念体系,涉及劳动、资本和剩余价值三大概念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应以资本为中心或核心,而是应“以人民为中心”,以劳动为核心概念,来全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资本论》的主要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规律和运行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吴宣恭教授认为,《资本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研究对象,包括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生产关系、社会矛盾二重化等最本质的问题,并帮助搭建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和逻辑框架,有助于解决当前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武汉大学简新华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有了重大创新和发展,提出了不少原创性经济理论,很少得到“国际经济学界”承认的根本原因不是“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未能与国际充分接轨”。强调“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说法并不准确,中国现在需要构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要“在研究范式上回归到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

中国人民大学邱海平教授则从《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关系出发,对比得出《资本论》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共同之处并指出了二者之间的特点,阐明了《资本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商品经济的运行、市场经济等

问题分析上的可继承性和一般规律，并着重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定要把握其“特色”所在，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属性，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才不会有失偏颇。

厦门大学肖斌副教授总结了当前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三种具有代表性的错误倾向：一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仅局限于生产力层次，并进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归为一种新的发展经济学；二是打着“兼容并蓄”的理论旗帜，混淆不同理论流派在概念内核和原则方法上的重大界限，肆意用“移花接木”的方式作理论嫁接和概念通约；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创造性运用”为名，颠覆“批判和革命的”辩证法，修正历史唯物主义。

三、《资本论》与中国当代

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南开大学张俊山教授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我国原有经济发展方式下长期积累起来的深层矛盾并吸收我国以往宏观管理中一些政策失误和教训所提出的战略任务。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所谓“供给侧”就是通过再生产活动不断更新的国民经济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结构方面认识那些妨碍国民经济正常循环、更新的因素，通过结构的调整来实现国民经济体系内部联系的合理、畅通。北京外国语大学尚会永副教授立足于长波周期，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了重新审视，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目标应该侧重于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及其不断生成的机制，通过具有全球竞争力企业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提升市场经济的质量及应对经济增长缓慢所带来的诸种压力。

针对国企改革发展问题，河南大学孙世强教授基于国内外国企私有化的实证研究文献，对“国企私有化能够完善治理、强化激励、提高效率”进行了证伪分析，并进一步推导出国企私有化滋生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最终仍旧要通过“重返国有化”路径来消除。淮北师范大学周志太教授则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揭示了我国严重生产过剩的根源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引起的所有制结构失衡，主张通过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进一步发挥国企的科技创新主力军作用，发挥国企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

针对三农问题，北京理工大学贾利军教授通过构建气候—粮食贸易模型，对美国碳排放量和中国玉米进口量的相关度进行测算，预测出2017—2025年我国的玉米进口量将远不能满足需求，存在粮食安全风险。并由此倡议，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及推行新的碳排放政策和建立贸易保护发展战略下，中国应重新确立中美粮食贸易战略，确保自身的粮食安全。山东财经大学冯道杰副教授则以塘约经验为例，认为贵州省塘约村在党组织领导下，在确保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基础上，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大力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实现了集体快速脱贫，走上共同富裕道路，为现阶段落实邓小平的“第二个飞跃”思想，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实现路径。

针对财富与收入分配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赵峰副教授基于Bhaduri-Marglin模型，运用1978—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对消费、投资、净出口以及总需求的长期效应。结果显示，我国当前的国内需求和总需求体制均为工资拉动型，但沿海地区的需求体制具有更明显的利润拉动型特征，并且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民间投资占比提升，我国的需求体制最终将向利润拉动型过渡。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黄华德）